

九龍城與何文田

提起九龍城，就會提起啟德。「啟德」名字起源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九龍城區啟德濱的發展。1914年，內地政局動盪，大批難民來港，區德聯同何啟爵士牽頭，與韋寶珊爵士、周壽臣爵士、曹善允、周少岐、伍朝樞、莫幹生、黃廣田、區權初、張心湖等人組成「啟德營業有限公司」，在九龍灣北岸大規模填海，得地120英畝，其中在龍津石橋一帶開闢多條街道，俱以「啟」和「德」命名，如啟德道、啟仁道、長安街、啟義道、啟禮道、啟智道、一德路至九德路等，街道最終只有約半數建成，沿街建有數百間房屋，此為啟德濱花園城市住宅區。

1914年，工程尚未動工，何啟病逝，區德為紀念亡友，就把經營的公司命名為「啟德營業有限公司」。填海工程於1916年開始，第一期於1920年順利完成，地方包括現今的啟德道一帶和太子道東前段。區德亦於1920年病故，之後第二、第三期工程遇上困難，先是房屋行情滯銷；又遇上省港大罷工，全港百業蕭條，第三期工程更是胎死腹中，公司終於財困倒閉。

政府於1927年接收了啟德濱，幾經波折，該處曾為飛行學校、空中運輸機場、空軍機場等用途，最後將之發展成為香港機場。1930年，機場落成，政府將之名為「啟德機場」，因為該處位於「啟德濱」。

二十世紀以前，多條小河，從現今黃大仙的腹地流向大海，鑽石山西麓之天然溪澗鳳凰溪是其中之一。戰前第一期的啟德填海區於1920年完成，將該處闢為「啟德濱」，建有「啟德明渠」連接附近的小河，並伸延至海岸；其後於1930年啟德濱被英軍改建為啟德機場。

1941年12月，日軍侵佔香港。1942年，日軍將蒲崗、沙地園、隔坑村、馬頭涌、蛟杯石、瓦窯頭及大磡村等村清拆，以擴建機場。啟德濱因此被拆除，而啟德明渠的路線也被改變了，原來在啟德濱出海，拉直至宋皇台側出海，日軍以明渠作為機場屏障。

今天的衙前圍，昔日圍門前，有古屋一排，名為「踏前」，亦因而被日軍清拆，築成現今之大水坑。戰後，港府在啟德明渠流域發展工業區，名為新蒲崗。啟德明渠亦改由今柏立基診所附近出海。明渠亦被稱為「啟德河」。啟德河不只在地理上，亦在歷史上與附近東九龍甚至整個九龍半島緊緊相連，並見證了香港發展和銳變。

土瓜灣牛房在 1908 年建成，佔地 1.7 公頃，牛房位於馬頭角道 63 號，當年由本地商人李平負責。整個牛房包括一間屠宰場、三間給牛、羊、豬的棚房，一間飼料房和兩間職員辦事處。

牛房的建築費總數 66,889,91 元，其 18,000 元是鐵路基金提供，但需興建一條鐵路連接紅磡火車站，方便從中國大陸運牲畜轉往屠宰場，替代已關閉的紅磡屠房。牛房初時由市政局管理，後交由漁農處負責，直至 1999 年 8 月上水屠房建成，便停止使用，交由產業署管理。

牛房的建築主要是木磚結構，黑色的天花和紅磚牆身，揉合中西設計，除用作辦公室的樓房是兩層高，其餘都是單層建築，用來寄放牛隻的棚房。最大的棚房長約三十多米，闊四十多米，高逾十米，地上還保留束綁牛隻的鐵環，飲水的水槽。牛房現時為二級文物建築。2001 年 5 月，政府將牛房租與本港的一些藝術團體、和一些商業藝術公司。

這些團體及公司本來於 1999 年租用北角油街政府物料供應處舊址，但因政府收回該地，另作發展，所以容許他們搬往土瓜灣牛房，租約最長三年。目前最大的牛棚被藝術公社租用，該社主要是租予學校、社團、藝術家作展覽之用。其他的牛房則一分為二或三，內有工作坊、展覽室等不同形式的藝術家及團體。現時的牛房，被這班志同道合的藝術家稱為《牛棚藝術村》。

經活化及改建而成的牛棚藝術公園於 2019 年 9 月啟用，為市民提供以文化和藝術為主題的公共休憩空間。牛棚藝術公園佔地六千平方米，設計以牛棚歷史為主題，設施包括避雨亭連座椅、草坪休憩區，以及附屬設施如洗手間及育嬰室。

馬頭角十三街唐樓群。馬頭角十三街是指位於九龍城道與土瓜灣道之間，在原日馬頭角牲畜檢疫站，即今牛棚的對面的十一條街道。該十一條街道均以中國傳統吉祥禽鳥命名。十三條街內的樓宇均是在 1960 年代興建的五及八層高的唐樓，沒有電梯。唐樓之間的街道原屬私家街。因此，不少車房在此開設，方便將車輛停泊在路旁。除了木廠街及九龍城道，十一條街現時已被政府收回管理，衛生環境得以改善。

十一條街由西至東，依次為：龍圖街、鳳儀街、鹿鳴街、麟祥街、鷹揚街、鵬程街、鴻運街、蟬聯街、燕安街、駿發街及鶴齡街。

龍圖街：龍是中國人的傳統吉祥動物

風儀街：鳳是有鳳來儀

鹿鳴街：鹿鳴代表功名成就；

麟祥街：麒麟送子、麟吐玉書

鷹揚街：鷹寓意英雄獨立，前程遠大；

鵬程街：鵬是鵬程萬里

鴻運街：鴻為鴻雁，鴻運當頭

蟬聯街：蟬聯意即首名

燕安街：燕子是候鳥，代表春天來到，萬物復甦

駿發街：駿是駿馬，有馬到功成之意

鶴齡街：鶴是仙人座騎，亦有長壽之意。

1920 年代，當時木廠街還是在海旁，有人在該處開設鋸木廠，將放在九龍灣畔的原條大木，拖上岸上木廠，以人工鋸開成木板作為木材。後來此處開闢街道就稱為木廠街。木廠街 19 號是於 1963 年成立的「香港盲人輔導會轄下工廠暨庇護工場」，致力為不同類別的殘疾人士提供多元化的工作訓練。透過工廠的營運模式，讓服務對象學習不同的工作技能。

宋王台：「宋王臺」碑石原本是一塊巨大的石頭，立在馬頭涌海邊一個稱「聖山」的小山上。《新安縣誌》中記載「宋王台在官富之東，有盤石，方平數丈，昔帝昺駐驛於此」，台側巨石舊有「宋王台」三字。1899 年，立法局通過《保存宋王臺條例》，禁止在宋王臺聖山採石。在 20 世紀初期，政府接受中國商人的捐款，環山築成石基，建成一個花園。

日軍佔港時，由於要擴展機場，將宋王台所在之聖山，取石填海，刻有「宋王台」三字的那塊石一分為三，但刻字得幸以保存，完好無缺。戰後，政府在殘石中找獲大石，將其削成長方形安放在現今之宋王台公園內，而聖山最終亦被夷平。公園現址於 1959 年底正式落成。

2014 年 4 月，港鐵沙中線土瓜灣站共有兩個考古工地，第一個共掘出五個宋及清代古井及 239 個遺址。第二個發掘一個宋代方井，及一個保留完整的宋代明渠和房屋地基，亦有耕地、房屋地基及過千箱陶瓷及錢幣。專家指地盤遺址可追溯至七百至一千年前的宋、元時期，至今已出土的六個古井及數千件文物，估算當年已有過千人居住，有很大機會是已埋沒的宋末聖山遺址，有高度考古意義，及後，當局決定宋皇臺地盤三個考古工

地，第一期工地發現的宋代石井會原址保留，但另四個石井及 200 多件遺址，古蹟辦與港鐵商討後，只作記錄，不作保留。

聖三一座堂是香港聖公會東九龍教區的主教座堂，也是香港聖公會在九龍半島的首間華人聖堂，及在香港的第三間聖堂，現址位於九龍馬頭圍馬頭涌道 135 號，始建於 1936 年，因政府另一次收地而遷至現址，由吳建中先生負責新堂設計，採用中國文藝復興式的形式，現被列為三級歷史建築。

堂名聖三一是指三位一體，即聖父、聖子及聖靈本為一體。他們在西差會傳教士范女士的協助下，又在聖士提反堂主任鄺日修牧師的領導下，教友漸多，便於 1901 年向政府申請在宋王台聖山附近建堂，並在 1902 年建成。鄺牧師在聖士提反堂退休，聖三一堂請他主理堂務，成為聖三一堂的首任牧師。

1903 年春因政府收回該地，堂址搬遷至附近今天亞皆老街兒童遊樂場附近，並在 1905 年建成新堂，由霍約瑟會督主持開幕典禮，當時可容三百餘人。之後該堂曾租用九龍寨城三座廢置官衙，作為藥局、學校及老人院之用。1921 年，鄺日修牧師去世。次年，諸聖堂李求恩牧師兼任該堂牧師。及後李牧師調任聖士提反堂，該堂堂務由諸聖堂曾紀岳牧師兼理。

聖三一堂再於 1936 年因政府另一次收地而遷至現址，成立建堂委員會，展開籌建工作。由吳建中先生負責新堂設計，採用中國文藝復興式的形式。6 月動工，11 月 21 日由莫壽增會督主持奠基禮。1937 年夏建成，7 月 4 日啟用。

相傳南宋末年，趙昰、趙昺二帝南逃至官富場。趙昰母楊太后，即宋度宗的楊淑妃，與其愛女晉國公主都有同行，後晉國公主墮海溺斃，屍身不能尋獲，於是鑄金身，葬於宋皇臺另一石山中，人稱金夫人墓，九龍宋皇臺遺址碑記有載。

1905 年，鄺日修牧師在宋王臺山腳立教堂。1959 年，為要建造宋王臺公園，搬到聖山北面，域多利孤兒院側。原是金夫人墓，墓因而毀。

上帝古廟：南宋末年，元軍南侵，南宋兩位幼帝輾轉南遷九龍「官富場」。本港地處南疆，多面臨海，盛產海鹽，故朝廷於南宋初年，已在九龍設置官署專門管理其事，名叫「官富場」，泛指九龍東部的地區，是廣東十三個鹽場之一，有駐兵一百五十人。南宋君臣移駐九龍官富場，在此營建宮殿，人稱「二王殿」。宋帝在九龍停駐不到一年，又再遷至他處。日久，「二王殿」傾毀，只存下基址柱石。

二王殿所在的村落，後人稱為二王殿村，位置在今天馬頭圍一帶，因都市發展於一九二〇年代清拆，史跡已難以稽考。據《新安縣志》記載，鄉民後來在行宮的基址上修建了一座北帝廟。原來宋帝離開開九龍，經荃灣北上，部分宗室和大臣未及隨行，便匿居於九龍城馬頭圍一帶，建村聚居，名為古瑾村。村落長達兩里，有圍牆環繞，故又名「古瑾圍」。

村內建有一座「上帝古廟」，供奉北帝，不少學者認為這廟宇就是宋帝行宮所在的北帝廟。北帝全名為「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廣東人慣稱「北帝」，香港各地都只有「北帝廟」，為甚麼這地方的廟宇要以「上帝」命名？據說趙氏宗室由北方南遷，因此避用「北帝」一詞，以免引起元朝懷疑。

清雍正以後，大量外姓村民從內地遷入古瑾圍，原居於此的趙氏後人在清光緒年間陸續遷至東莞，古瑾圍被夷為平地，「古瑾圍」這個村名也由後起的「馬頭圍」所取代。上帝古廟則日久失修，只剩下基址、柱石和石刻門聯。到了一九六二年，政府為了紀念這段事蹟，在上帝古廟的遺址修建了一個小公園。

公園落成之日，由市政局議員李有璇醫生主持開幕典禮，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則撰文紀述古瑾圍歷史，且刻成「九龍古瑾圍上帝古廟遺址闢建公園記」的石碑，置於公園之內，供遊人憑弔。上帝古廟遺址只剩下一座石門，門額上刻「上帝古廟」，兩旁對聯為「真義著千秋，煌煌氣象；武功昭萬古，赫赫聲靈」。門基至今仍在，戶樞猶存。

「石屋家園」前身為「何家園」，約於 1880 至 1890 年代，何氏家族於現址土地上興建了一幢樓高兩層連果園和花園的半歐陸式華麗大宅，名為「何家園」。1941 年日軍侵佔香港，為了擴建啟德機場，日軍將九龍城多條村落，包括蒲崗、沙地園、馬頭涌、瓦窯頭、蛟杯石，隔坑和大磡村等村落拆卸。其後在九龍塘興建「模範村」，以安置上述鄉村村民。同時日軍將殘破的何家園大宅拆毀，並在其地基上興建一群包括現時石屋的兩層高中式平房，並改名為「侯王新村」，其後又改名為「侯王廟新村」。

石屋為極少數在日治期間興建而現存的建築物。戰後大量難民湧入香港，石屋一帶成為寮屋區，被稱為侯王廟新村、荔枝園和何家園。到了 1950 年代，侯王廟新村及其附近地區成為了製片廠的集中地，寮屋區內曾開設多間片場，如長城片場、世光片場、友僑片場、國家片場等。

到了 1950 代末，長城片場遷出，片場原址及其附近寮屋逐漸發展不同類型的小型工廠。石屋亦租予專營墓碑工程的「藍恩記山墳墓碑工程」及「永盛裝修工程」。侯王廟新

村於 2001 年清拆，石屋成為村內僅存的建築物。為了保育歷史建築，政府在 2008 年開始推出「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

石屋被劃入第二期的活化計劃。並由五旬節聖潔會永光堂屬下非牟利機構永光鄰舍關懷服務隊有限公司成功投得石屋進行活化，獲政府撥款 3,900 萬元資助復修，以社會企業方式營運。活化致力保存石屋的建築特色，包括木建築的結構、石砌以及部分用磚塊建成的牆壁、金字形屋頂、設於門上的木鎖和石插孔等，以反映香港於二次大戰期間的建築特色。在 2010 年，石屋被古物古蹟辦事處列為三級歷史建築。2015 年 10 月 9 日「石屋家園」開幕，並開放予公眾參觀與享用。

民生書院最初由紳商曹善允提倡興建。1916 年曹善允與區德及其他商人組成之啟德營業有限公司正著發展九龍寨城對開的九龍灣北岸地帶。曹善允有感當時九龍城居民缺乏接受西學的機會，於是開始積極籌款興學。區德又名區澤民，於 1920 年逝世後，遺囑示捐款一萬元以覓地興建學校，莫幹生亦捐助一萬元贊助，學校終於在 1926 年由曹善允建成，以區澤民及莫幹生的名字中的最後一字命名，那就是民生書院了。

籌得資金後，更獲當時聖保羅書院校長史超域（Arthur Dudley Stewart）牧師協助，民生書院得以在 1926 年於啟德濱創辦，曹善允獲推舉終身出任校董會主席。學校成為啟德濱的配套學校，初期租用伍朝樞的物業作為校址，及至 1939 年，遷至九龍城東寶庭道繼續辦學至今。

侯王廟位於九龍城聯合道和東頭村道交界處，是一小型中式廟宇，屬單層建築，採用清代最常見的兩進一院設計，建於平台之上，入口正前方有一涼亭。

從「山崗不毛之地」到客家村落。關於「何文田」這個地名的早期歷史，可謂一鱗半爪，難窺全貌。而 1860 年中英《北京條約》的附圖在今日何文田的位置上標記「此一帶皆係山崗不毛之地」。在康熙、嘉慶《新安縣志》與 1894 年《新安全圖》中，均未見載「何文田」一名。

何文田地名的由來，今日的何文田位於九龍半島中部的山崗高地，但「何文田」之名，最初源自位於昔日彌敦道、亞皆老街與染布房街之間的一條山谷的村落—何文田村。何文田村的得名，主要有兩個說法：得名自地主陳何文。一說何文田當年為地主陳何文所擁有，該地以其為名。二說得名自開村的客家族。有說當時客家何、文兩氏來此開墾立村，故名。類似說法是「何文田」是指何、文、田三氏共有之地。

二戰前黃佩佳的《香港本地風光：附新界百詠》，曾將「河門田」列入華人墳場之列，有說何文田為其諧音訛變而來。「何文田」之名首次見載，要遲至 1901 年港府工務局的《九龍規劃圖》，當時何文田的指稱範圍，僅僅是大石鼓(近今天亞皆老街與和窩打老道交界處)、紅磡山(今十二號山)及採石山之間的山谷一帶，即今日彌敦道、亞皆老街與染布房街之間。該圖亦將何文田村西南方的火棚(Fo Pang)及大眠田(Tai Min Tin)兩條古老村落標出。

何文田村到 1920-1930 年代，已因城市發展而消失，但作為地名的何文田，卻隨着社區發展，擴展到位於原何文田村東南方、因而被命名為「何文田山」的山崗地帶。十九世紀下半葉，何文田主要是石匠、菜農和養豬的聚居地。¹

887 至 1888 年間，天花肆虐香港。早年香港政府對天花這種傳染病束手無策。1907 年東華醫院董事局向政府申請，將原用作收容鼠疫患者的西環分局，改為收容天花患者的痘局。政府同意，於 1910 年啟用。1938 年改為政府傳染病醫院。二次戰後拆卸，只餘正門門樓置放附近公園。

1911 年廣華醫院啟用時，為了隔離天花的病人，以免傳染其他病人，廣華醫院特別在何文田山麓建了一座天花病院(Smallpox Hospital)，專為天花病人留醫的院舍，當時稱為「油麻地痘局」。「油麻地痘局」，當時用來隔離天花病人，位置大概是現在的培正道和常盛街交界。建築油麻地痘局時，開一條山路到痘局去，這條山路初時命名為何文田山道，即今天何文田街的前身。廣華醫院同時向政府申請，將何文田山撥給醫院作為墳場之用，以便下葬去世的天花病人。因此，在痘局背後的山上是墳場區。

其後天花疫苗逐漸普及，使用中醫治療的痘局因此式微。由於普遍實施贈種痘苗。天花症逐年減少。到 1920 年只有二名患天花的病人留醫。為了開源節流，在廣華醫院內另闢傳染病房，而將何文田山麓的「痘局」租給一間爆竹公司作爆竹工場。

這間公司名“台山電光炮竹公司”，月租 75 元。由 1920 年 10 月開始生產爆竹。不料在 1921 年 2 月 25 日，這間爆竹廠的火藥庫突然爆炸。造成 32 人死亡，56 人受傷，痘局已毀。後在痘局的路邊，建一座「千里亭」，供送殯者在亭上作辭靈之用。

二次大戰前，凡廣華醫院病故者多葬於九龍義墳。1927 年，時任廣華總理顏成坤為方便居民辭靈，倡議建一辭靈亭。直到 1931 年，東華三院通過此建議，請求港英政府撥地，面積約一千六百呎。該辭靈亭命名為「千里亭」，取其「送君千里，終須一別」之意。香港淪陷期間，千里亭被拆毀。戰後，何文田墳場遷往和合石，千里亭失去原有功

能，該地段交回政府。1931年11月，政府通知將何文田山收回。自1938年1月1日起，不准再使用該墳場，而另闢一新墳場在牛池灣附近。

到1951年政府再通知，將墳場內的先人骨殖起出，改葬別處，於是何文田山便開始發展。而將何文田山道延長至山上。後來該區繼續發展，何文田山道繼續延長，於是又將窩打老道口轉入的原名何文田山道的一段，改名為何文田街，以別真正通往新發展的何文田山去的道路。至二十世紀初，隨著亞皆老街的落成，何文田一度變得十分繁盛。

1902年，當局選擇了何文田西南面的軍事用地改改建為皇圃（King's Park，後來改用音譯京士柏），亦紀念英皇愛德華七世於1901年登基。1903年，當局又在皇圃旁興建一條由紅磡至佐頓道的加士居道。1910年代位於加士居道傍的皇圃（後來改名為京士柏），意即為英皇的花園。

1960年代，當局在附興建了一座女皇的醫院，即伊利沙白醫院，1920年代後，由於彌敦道延伸至旺角，何文田人口遂相繼西移。戰後何文田的範圍也從早期的亞皆老街、窩打老道及勝利道的三角地段，伸展至今天愛民邨一帶。與此同時，港府曾在何文田山旁築有一條小路名楠道，楠道後來發展成主要幹道（1966年改名為公主道，以紀念英國瑪嘉烈公主訪港）。至1970年代，何文田已發展成一公營及私人住宅區。

1951年政府平整何文田墳場時，在何文田山上試辦一種自治式的木屋區和平房區。當時在山上開闢兩條木屋和平房屋村，一條名樂民村，另一條叫治民村。當時香港鬧屋荒，又有大批人從內地湧進。他們在各處荒蕪的地點蓋搭木屋居住，亦有人僭建石屋出售，雜亂而衛生惡劣。由於何文田山早由政府指定為墳地，是以有沒有僭建的木屋和石屋。

為了解決屋荒，又避免木屋區常發生火警，因止在該區成立治民村和樂民村，將廣華醫院在山下興建的「千里亭」改為辦事處，名為「何文田徙置區合作社」。當時樂民村在山的北面，治民村在山頂。後來在各區興建大量新型屋邨，樂民村和治民村已不復存在，

60年代初，當局在舊日治民村的地點，建築一條與公主道連接，以貫通何文田區對外交通。這條路因在治民村的原地興建，故命名為治民道。後來改為治民街。公主道是何文田通往窩打老道的主要通道。

公主道原名「楠道」，1950年落成。「楠」是指蘇格蘭的楠郡，早期只由巴富街至窩打老道，50年代後期，何文田區整理發展時，將楠道向何文田山上伸展。1966年3月1日，英女皇的妹妹瑪嘉烈公主訪問香港，3月2日在香港主持「英國周」的英國工業展覽會開幕禮。為紀念這次訪問，楠道於1896年易名為「公主道」。

二戰結束後，香港校舍缺乏，師資嚴重不足，造成大量兒童失學。全港只有六間官立小學，學費每期亦只是 30 元，但學額根本無法滿足需求；而私立學校每期學費則高達 100 元以上，勞工階層根本無法負擔，以致工人子弟陷於大量失學的境地。

為回應工人的要求，21 間工會聯合起來，於 1946 年組成「港九勞工子弟教育促進會」（簡稱「勞教會」），創辦勞工子弟學校（簡稱「勞校」）。1946 年 9 月，第一間勞校成立，由於當時沒有校舍，只得借用海軍船塢華員職工會位於灣仔駱克道的會址上課。

1947 年 2 月，第二間勞校——「旺角勞工子弟學校」成立。到 1948 年，已創辦了 12 間勞校，在學學生達二千多人。這不僅在一定程度上紓緩了勞工子弟的教育問題，也為港九愛國工會的聯合打下了基礎。勞校從 1947 年 9 月創辦第一間開始，到 1948 年已達到 12 間，其後再調整為五間。時至今天，集中為「創知中學」（前稱勞工子弟中學）和香港專業進修學校（前稱旺角工人夜校）。勞校由創辦（1946 年）、建校（1951 年）到擴建（1957 年）和改建（1985 年），以及每年辦學經費的籌措，都與各行各業的工人和社會各界的熱情支持分不開。

大石鼓廟與旺角山東街水月宮。旺角水月宮本來位於九龍塘窩打老道與亞皆老街交界，當時該處稱為大石鼓（近窩打老道與亞皆老街交界處），建於 1884 年。

這座當地鄉民稱為「大石鼓廟」的水月宮原由芒(旺)角、何文田及其他附近的客籍鄉民倡建。廟宇曾於 1908 年進行一次大規模的重修，費用除由附近鄉民籌集外，一些油麻地的商戶亦大力支持有關工程。搬遷以前，該廟香火非常鼎盛，每年農曆二月十九日觀音誕均有「打醮」活動，並上演「神功戲」。

到了 1926 年，由於政府擴建道路，水月宮被遷至現址山東街，交由廣華醫院重建及管理，並於翌年重新開放。1931 年，東華醫院、廣華醫院及東華東院正式統一為東華三院，因此該廟改由東華三院管理至今。每年度之「觀音開庫」寶誕，吸引大批善信前往參拜。

水月宮奉祀觀音、包公、龍母及六十太歲，同時亦有供奉阿彌陀佛及地藏菩薩。廟內仍保留有光緒十年(1884)銅鐘及 1927 年重修碑記。

何文田勝利道一帶，如今只是平凡的住宅區，但背後其實有著不凡身世。這裡曾經是香港首個「花園城市」實驗場地，由熱衷園藝的葡萄牙人發起，居民亦以葡萄為主，發展自給自足的互助社區，日軍佔港時更一度是葡萄牙領事館所在地，憑藉中立國地位接濟過大批難民。

開埠之初，英國人還不適應香港水土，惟獨定居澳門數百年的葡人早就習慣華南氣候，又精通多種語言，因而深受殖民政府與商人器重。葡裔人口多數聚族而居，最初在半山區落腳，今日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座堂，便是初代葡人為自身宗教需要在社區附近興建。

一位葡人領袖梭亞雷斯（Francisco Paulo de Vasconcelos Soares）建議在九龍何文田建立「花園城市」，最終成為緩解住屋需求的方案。梭亞雷斯父親馬蒂亞斯（Mathias Soares）是澳門加思欄花園（Jardim de S. Francisco）的設計師，被形容為「熱情的葡萄牙種植者」，開埠初年在西營盤花園洋房醉心園藝實驗。

英國接管九龍半島後，其葡裔園藝同好羅郎也（Delfino Noronha）和老沙路（Marcos Callisto do Rozario）於 1876 年投得油麻地海邊的農地，興建馬來亞風格避暑莊園，位置大概是今日彌敦道與窩打老道交界。馬蒂亞斯夫婦在 1883 年突然雙雙離世，遺下年僅 15 歲的梭亞雷斯。梭亞雷斯由親戚撫養，入讀天主教名校聖若瑟書院，

1901 年迎娶家勢顯赫的葡裔女子艷馬（Emma da Soledade Selavisa Alves），躋身在港葡人社群的核心。梭亞雷斯遺傳自父親的園藝志趣，卻充分表現在花園城市計劃當中。梭亞雷斯於是看準九廣鐵路以東的何文田地段，位置介乎今日亞皆老街與窩打老道之間，當時仍是未開發的荒野。

1913 年起，梭亞雷斯花數年時間平整土地，並開始建屋工程。適逢英國戰勝第一次世界大戰，梭亞雷斯把其中三條主要街道，分別命名為勝利道（Victory Avenue）、太平道（Peace Avenue）與自由道（Liberty Avenue）。他又以家族名義命名梭桿道（Soares Avenue）、以妻子之名命名艷馬道（Emma Avenue）、以女兒之名命名棗梨雅道（Julia Avenue）。

被奉為「何文田之父」的梭亞雷斯，居住在自由道 2 號兩層高大宅，接近花園城市的中心，曾經招待不少政要名流，包括有後來擔任葡萄牙總統的軍官達科斯塔（Manuel Gomes da Costa）。因梭亞雷斯的名字 Francisco 與美國城市“San Francisco”相若，於是將「梭桿道」與「勝利道」中間的小巷稱做舊金山徑 “San Francisco Path”。